

姜 琦 著

中國國民道德原論

商務印書館出版
大華印務局印行

姜琦 著

德育原理

本書係「中國國民道德原論」一書之詳本，不啻有「母子」的關係，二書可稱之爲「母子篇」。內容豐富，解釋詳明。讀了「中國國民道德原論」以後，可不再讀本書。

每冊定價臺幣貳拾伍元

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坊

臺灣人民導報社經理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重慶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臺灣版

中國國民道德原論一冊

定價臺幣柒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姜

琦

發行人

王

雲

五

出版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所

大

華

印

務

局

經售處

人

民

導

報

社

臺灣撫臺街

臺灣撫臺街

重慶白象街

經理部

臺灣版序

本書曾於民三十三年十一月間在重慶陪都爲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我之所以要發刊這部書，其動機便是在於恭讀了 蔣總裁（以下概稱總裁）曾於民國三十二年間所發刊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以後，有所心得而欲加以闡發的。惟其如此，故本序不先從 總裁「中國之命運」那部書內容之大綱說起，然後再來說明本書與 總裁「中國之命運」一書有怎樣的關係。

總裁「中國之命運」一書，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標明「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同時，又詳論「這一部悠久的中華歷史，基於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我們知道：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的綱維，爲禮、義、廉、恥。」復次，總裁揭出「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認爲「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便是它的由來和它的起源。復次，總裁又列舉「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深刻化——（一）不平等條約對政治和法律的影響，（二）不平等條約對經濟的影響，（三）不平等條約對社會的影響，（四）不平等條約對倫理的影響，（五）不平等條約對心理的影響；同時，更要我國民加以反省與自責。復次，總裁再歷述「由北伐到抗戰」間所有一切內政和外交之經過。復次，總裁指示「平等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認爲今後建國工作之重點有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五方面。復次，總裁又指示「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一）建設與革命哲學之建立問題，（二）社會與學術風氣之改造問題，（三）自由與法治觀念之養成問題。復次，總裁再指示「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復次，總裁還說明「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最後，

總裁更結論着：「……我們一回想百年來的痛苦，更要繼續我們殉國的軍民同胞和革命先烈的遺志，祖述五千年來立國的精神，恢復我們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氣，抱定決心，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篤行國父『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各就其職業地位，各依其聰明才力，來改造社會與學術風氣，養成自由與法治觀念，共同一致，指向建國的目標——就是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項的建設，努力實行文化、經濟與國防合一的整個建設計劃，期與同盟各國來分擔共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類的責任。」

上述的總裁這許多指示，歸納起來，不外乎要遵照國父遺教所詔示之五大建設——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而進行的。這五大建設，無論從國父遺教或總裁指示講來，當然是要同時並進的；不過，就中須以「心理建設」為最重要。因為社會、政治、經濟三方面的建設，不消說的都須靠着國民有健全之心理，就是倫理方面的建設，也不能不有待於健全的心理之形成。這不啻朱子所說的「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一般。揆諸學理，社會、政治、經濟三方面之建設，多屬於「知」，尤其屬於科學的知識；而倫理建設，多屬於「行」，尤其屬於「篤行」之「行」。至於心理建設呢，它一方面是屬於「知」，他方面是屬於「行」；同時，又須做到「知行合一」的。總裁說：「篤行國父『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總裁這一句話便是指「心理建設」而言的。國父自己在「建國方略」一書中，也曾標明「心理建設」為「行易知難」，後人多稱之為「孫文學說」。不但如此，國父還說：「建國之基，當發端於心理。」並且在建國程序上，把「心理建設」列在其他各項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之前。由此，可見「心理建設」一項有怎樣的重要性了。然則總裁所以把「心理建設」列在建國工作的重點之第一位，決非偶然的。

什麼是「心理建設」？除掉上面所說過的，這便是 國父所詔示的「行易知難學說」之外，陳立夫先生對於「心理建設」下過一個很有價值的定義，說：「何謂『建設心理』？曰：禮、義、廉、恥所形成之心理是也。」（參看本書第一章註十二）陳先生這個定義，可以說更能使 國父「行易知難學說」具體化，他不但解釋「心理建設」本身之意義，並且要使「心理建設」與「倫理建設」二者之關係力圖密切，打成一片，不啻要謀「知」與「行」二者之合一的意思。然則怎樣能够形成這種禮、義、廉、恥之心理呢？我可答覆一句話，無論心理建設也好，倫理建設也好，抑或心理建設與倫理建設二者之結合也好，它總須依靠於教育。因此，所謂「心理建設」，便是「教育建設」的意思。總裁說：「心理建設的最大的責任，尤在於我全國中、小學校的教師。因為中、小學校的教師乃是少年學生的德行、知識和體格的保傅，其影響於青年和未來之國民，比大學教授更深更大。……政治、社會各方面，更須深切認識此中、小教育使命的重大，特別加以尊重與愛護，予以鼓勵與獎勵，使中、小學教育能與大學教育在經濟與人材上平衡發展。中、小學教育能够益臻於健全，則心理建設，自可以成功。抗戰犧牲所獲得的獨立自由，始有其堅實的基礎，而革命建國的理想乃不致落於空談。今日有志於教育的青年，不僅不得輕視中、小學教師之職業，而應認此為報效國家第一等大事，與復興民族最基本的急務，故青年能以擔任中、小學教師，特別是教育基層的小學數師為志節，埋頭苦幹，敬業育才，勿沽譽釣名，勿好高騖遠，是為今日建國工作無上之至寶。如此，國民的心理建設乃可以有成。」（見「中國之命運」第一三九—一四〇頁）總裁這一段話，豈非視「心理建設」與「教育建設」二者便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嗎？他特別的看重教育中基層的小學教師是國民心理的建設之最基本的工程師，應當加以尊重與愛護，予以鼓勵與獎勵的。

照上述的理由看起來，我們就可知今後的臺灣更需要心理建設的。因為我中國自鴉片戰爭、中英南京條約的訂定以還（前清道光二十二年即西曆一八四二年），如總裁所說，我國民的心理大受影響，漸變，初則懼外，繼則媚外，幾乎把禮、義、廉、恥的心情喪失殆盡，使全中國國家都淪於外人的次殖民地了。經過五十多年，日本要步英、法等國之後塵，她藉朝鮮問題，無端的對我們肇啓甲午之役（前清光緒二十年，即西曆一八九四年），竟把我臺灣攘奪去了。就時間論，我臺灣淪陷於日人之手，離則不及鴉片戰爭以來的年數之半（截至上年十一月廿五日日本投降止），然臺灣同胞會所受之恥辱和苦痛，比之內地同胞受外人尤其受日本所虐待和欺侮之程度，當然加倍。因為臺灣在過去的五十一年間，直接的受日本所統治，所以臺灣淪為次之又次的殖民了。惟其如此，故我們雖則不能說全臺灣同胞的心理都發生變化，然而我們敢相信至少有一部份人民不免惹起心理上之變態；同時，倫理方面也不無被破壞，日趨腐敗了。因此，今後臺灣之建設，不能不對這少數人民的心理加以一番重新改造。

但是在另一方面講，臺灣的小同胞（即小學生），如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兒童一樣，正如總裁所說，少年學生，性情未定，知識尚淺，恰如一張白紙，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惟其如此，故臺灣小同胞，本來大都在不知不覺的和後知後覺的地位，一方面生來就具有禮、義、廉、恥的心理之發展性，他方面並不知覺什麼叫做「禮、義、廉、恥」。如果我們要使這般小同胞生來所具有的那種禮、義、廉、恥之心理有所實現，使他們都能够知道「禮、義、廉、恥」，那麼，我們非使少數先知先覺者（即學校教師，尤其小學教師）來循循善誘不可。這當然是教育學上的一般法則，然而就事論事，我覺得今日的臺灣教育更要着重這一點，並且比之內地的一般學校教育形成上述的那種心理來得快，同時又

很容易收效。因為內地的一般學校教育往往受了外界環境的種種影響，尤其為各色各樣的政治潛勢力所支配，不免發生障礙，難於順利進行的。至於今日的臺灣呢，她已經一旦完全脫離日本的統治；同時，又沒有其他各色各樣的政治思想存在着，純然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因此，今日的臺灣小同胞之心理，不啻一張最乾淨的白紙，毫未曾受過濡染，很容易描寫的一般。照這樣的說起來，今日的臺灣小同胞心理之建設，可以說是完全從幼芽培植起，容易順利的發苗、成幹、生葉、開花、結果，毫不受窒礙的；用不着如同內地的兒童心理之建設，多少是要從中途轉變過來，不啻「配種」或「接木」一般。由此，可見今日的臺灣兒童心理之建設比之內地的兒童心理之建設來得快，同時又容易收效，可以相信的。不但臺灣兒童心理之建設有如此速而易，並且我覺得一般成人心理之改造，大概也有同樣的速度和效率。

總之，今後的臺灣，無論對於一般成人或對於幼少兒童，心理建設，乃是當前的急務。然則去年的除夕，陳長官所以發表廣播認為本年度行政工作着重政治、經濟、心理三大建設，同時並進的；今年的元旦，臺北市政府黃市長所以發表文章，標題為「新臺灣的心理建設」（見新生報本年元旦增刊），其命意就不外乎此。

以上所述，是關於本書之內容與 國父遺教暨 總裁著作「中國之命運」一書有怎樣的關係之輪廓的說明。復次，再就本書之體裁而論，本書又遵照 總裁會於民國三十八年三月間所製訂之「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表」而編著的。關於這一層，請參看本書結論，便知其詳，茲姑不說。

總括起來說，本書寫作之動機、目的和經過，最初是完全淵源於 國父遺教及 總裁著作而出胎的；最近又是竭力響應陳長官暨黃市長之政策和主張而再版的。現在我忝列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的地位，

以主管本市國民學校教育——小學教育——爲職責；因此，我不能不遵照 國父遺教和 總裁指示暨陳長官和黃市長之意旨，對於臺北市民，尤其對於市內一般小同胞的健全心理之建設負有重大的使命。至於「新臺北市民的心理建設」之方法呢，美國杜威（J. Dewey）說：「教學法，不在教材之外，乃附麗於教材的裏面。」因此，我們姑且不說怎樣教，現在祇談怎樣選擇教材。本書所選擇之材料，前面已經說過，完全採用 國父所詔示之中國固有的「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再佐以 總裁所訓示作爲全國各級學校之共通的校訓「禮、義、廉、恥」四維，更益以中國古訓上所謂「三達德」——知、仁、勇，最後，還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一月間 總裁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議通過的由八德、四維和三達德合成而製訂的黨員守則十二條（後來教育部通令作爲全國各級學校青年守則）而編著的。不但如此，本書更以三民主義爲最高原則，除掉根據中國固有文化之外，再參照西洋最新學說，對於國民道德之意義及中國國民道德之本質、現象、法則、綱領、教育、實踐、目的等詳加闡釋，並將日本統治本省時代所流傳關於國民道德的意義之曲解及其所施行的「皇民化教育」之錯誤一掃而空。惟其如此，故我自信本書可以供作中、小學教師之藍本，但不宜直接的提示於學生，祇要各位教師運用自己的智力把本書內容化爲適當的課本，由淺而深、由近而遠、由卑而高、由具體而抽象，按步就班，因材施教，使各個兒童都能够形成其健全的心理和人格，以作將來投身社會做個善良的分子之準備。

因爲有了上述的這個緣故，所以本書在目前的臺灣有發行之必要。但是本書在內地印本無多，再加以受交通工具缺乏之影響，運輸不便；無已，祇得姑先商承商務印書館經理王雲五先生之同意，把本書委託此間大華印務局代印發售，名之曰「臺灣版」。俟本版售完後，再與商務印書館依據版權讓與契約辦理，

並今後請商務印書館逕將本書輸進本省，俾便購閱。這是題外的話，此地無須多說。現在所要說的，祇認爲本書在此間有迅速發售之必要。但是本書內容，缺陷尙多，固然不敢說使讀者諸君「先睹爲快」，然爲應急計，我不能不採用權宜的辦法，把本書趕緊披露出來，先與本省同胞在文字因緣上行一度相見禮，以開彼此互相切磋、互相觀摩之端緒。倘承讀者諸君不棄，賜予教正，俾免誤謬，則不特我個人之幸而已。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姜琦序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蘇序

二十年前，余在溫州師範學校，始讀伯韓先生所爲中國國民道德概論一書，而心儀其人。厥後屢讀其鉅著，若西洋教育史大綱、現代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學、抗戰建國與民生哲學及其未刊本三民主義哲學、德育原理等，無不獨開風氣，直接潮流；唯特篇章繁富，且亦精義入神。比年余造文化綜合論、民生哲學引義諸書，先生嘗爲文張之，書疏往返，獲益良多。今春先生調任國立編譯館編纂，而余亦移家北碚，寒齋清茗，昕夕承教，忽不自知遷流之苦也。談次，因出新編中國國民道德原論一書囑序，余讀而狂喜，以此書在先生諸作中，實爲創格，簡要流通，允符鄙意；且其援引古誼，取益新知，甚得左右逢源之樂，而「格義」工夫，邏輯訓練，尙其餘事也。綜讀全書，佳義紛陳，而論中國國民道德之含有世界性，與夫三民主義之涵蓋精神，尤見切實。蓋其治學方法，重批判，貴綜合，與余有同嗜；此固東方人圓融周徧之態度，抑亦秉承 國父「淵源舊學」、「攝取新知」，而「獨創發明」之三段教也。余以末學，敢贊一辭，聊因下問，藉證玄旨云爾。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初夏後學蘇淵雷拜敘於鉢水齋

自序

民國四年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中國國民道德概論」一書；那一部書是以當時的社會情形和世界潮流爲背景。就社會情形論，大家都曾記憶得，當時正在袁氏圖謀不軌，推翻共和，帝制自爲；因此，我們中國固有的道德之精神，喪失殆盡。就世界潮流論，當時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正結束的時期，民權主義之呼聲，一時頓形澎湃，將取民族主義而代之；因此，我們中國的教育宗旨也大受其影響，輒將「軍國民教育」完全刪除，祇講求怎樣發展健全人格，而太側重於個人的自由了。

綜合上述的這兩種背景而考察，當時中國國民道德之根本既然發生動搖，所以我們不能不共同的起來設法救濟它。美國社威 (J. Dewey) 說：「社會哲學之產生，是在於社會有病的時候；政治哲學之產生，是在於政治有病的時候。」由此，可見道德哲學之產生，也是在於道德有病的時候。上面所述的那種因當時的社會情形和世界潮流而發生動搖之道德的狀態，就是一種「道德病」；因此，我們就着當時所有國民道德之狀態而提出些怎樣的改造和建設問題來討論，這就是要針對着當時所有的「道德病」予以救治之一種道德哲學。從前我那一部「中國國民道德概論」，不啻就是這樣的一種著作；但是這屬於理論方面的話，若就事實論，我那部書的論旨，是否切中時弊，尙屬疑問。

然而降至今日，時過境遷，從前我那一部書，當然早已不適用了；因此，我非對於它加以一番增訂不

可。但是事與心違，我雖屢欲增訂那部書，然又因懶於握管，未克如願；此外，再加以連同那部書原本也已絕跡，到處尋覓，終不能獲得的，不過它的內容，多少還能憶起其輪廓而已。最近，我讀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深深的覺得「倫理建設」是決定我中國的命運之一件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就不揣謏陋，聊盡國民所應有的一分天職，發願編纂這部書；即一方面仍以從前我的部書的內容為張本，他方面再以今日的社會情形和世界潮流為背景而寫定的。質言之，本書不管就是從前的舊作之增訂本一般。

在最近的半年間（即自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至三十三年一月杪止）曾經在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寫過「德育原理」（一名「應用道德學」）一書；那部書之編輯旨趣和內容，與本書大致相同。然而它是為着要供作大學「倫理學」和「教育哲學」兩學程——尤其是師範學院公民訓育科「訓育之理論與實施」一學程——之參考書而撰寫的，所以它的字數較多（約計五十萬餘言），一時不克付梓；因此，本書又不啻就是拙作「德育原理」之節本一般。但是本書的內容有些却是前書所遺漏而未曾論及的；因此，本書又可以說是前書之續編。

本書在匆促的期間內，僅費了兩週間的功夫，把它寫成了。我雖則有前兩部書做張本，然而一憑記憶；一靠摹仿，覺得增訂和補遺比之創製更難。因此，乖謬之處，仍然不少。幸祈讀者諸君有以指正之。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國民道德之意義	九
第三章	中國國民道德之本質	一八
第四章	中國國民道德之現象	二九
第五章	中國國民道德之法則	三八
第六章	中國國民道德之綱領	四六
第七章	中國國民道德之教育	五七
第八章	中國國民道德之實踐	六九
第九章	中國國民道德之目的	八〇
第十章	結論	九三

中國國民道德原論

第一章 緒論

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够完全建立並且能够生存，好像我中華民族既有廣大之土地，衆多之人民和完整之統治權；同時又有悠久的五千餘年之歷史；在過去，雖屢經被挫折，在現今，雖正遭被侵略，然而我們始終不致於被滅亡，反而愈經被挫折和愈遭被侵略，我們愈加要奮勵，集中羣力以締造其國家，共禦外侮以保障其生存，其原因就是在於我中華民族本來具有一種完美的德性，它能够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的緣故。這種完美的德性，照國父所詔示，它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註一）；照總裁所指示，它又是禮、義、廉、恥四維；註二。總裁對於中華民族所固有的德性還有一段指示的話，恭錄在下面；

「在這八德和四維薰陶之下，中華民族，立己則盡分而不渝，愛人則推己而不爭。義之所在，則當仁不讓；利之所在，則纖介無私。不畏強梁，不欺弱小。積五千年的治亂興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恥，辱負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知恥，故能自強。循分故不陵侮異族，自強故不受異族的陵侮。惟其侮辱，故民族的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著的。惟其負重，故民族的志氣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由此種德性的推演，故中華民族的各宗派及其國民皆能爲大羣犧牲小體，爲他人犧牲

自我，而養成其自衛則堅忍，處世則和平，更進而以『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仁愛之心，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忠恕之道。所以五千年來，東亞各民族或內附而融和，或相依而共保，或獨立而自存，各順其民志民心，各隨其國情民俗，各發展其文化之所長，以貢獻於人類共同的進步。」

(註二)

照上面所恭錄的總裁這一段話看起來，我們就可知我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完整的國家和悠久的歷史，完全基於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同時，我們又可知我中華民族所固有的這種德性，不僅祇含有一國所獨有的國民性，並且包含有全世界所共有的人類性。譬如八德，就中除掉「忠」、「孝」二字稍含有國家道德之性質外，餘如仁、愛、信、義、和、平諸德，無一不是與人類道德有關的。再廣義言之，就是「忠」、「孝」，也未嘗不是兼含有人類性。國父詔示過我們「忠字不但忠於君；並且忠於民忠於事。」(註四) 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註五) 此地所謂「事」和「人」，都是泛指人類而言，並沒有國際的界限可言。國語楚語：「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照汪遠孫所注釋：「孝亦善德之通稱，非指事親言之。」漢書藝文志：「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呂維祺孝經或問：「孝經何爲而作也？曰；爲闡發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作也。又；孝經論孝大抵在立身行道；德教治化上說；非徒爲曾子言，蓋爲天下後世之君天下者言也。」綜合以上數說；我們又可知「孝」字並非如今俗所云；祇是指事親而言；乃是善德之通稱；也有沒國際的界限可言。

復次；就四維而論，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註六) 照管子這幾句話看起來，所謂「四維」；固然是一種國家道德；然推而及之；這四種道德，也未嘗不是與全體人

類有關的。教育部頒佈訓育綱要有說：「處事而不逃避其艱危（義）待人而不怠慢其禮節（禮），接物而不苟且其取與（廉恥）」（註七）此地所謂「事」、「人」和「物」三者，也都是泛指人類而言，並沒有國際的界限可言。總之，我中華民族所固有的道德，無論八德或四維，都是本於「天下爲公」這個原理。關於這一層，等到後面討論中國國民道德之目的的時候，便會知道的。但是我中華民族所固有的一切道德之原理和目的雖則在於「天下爲公」，也就是禮記禮運篇所謂「大同」，然而它並非絕對的不講什麼差別的，乃是認爲在某種情形之下，無論個人與個人，或國家與國家之間，仍然講求些合理的差別而維持其秩序和紀律。然則禮運篇之所以在所謂「大同」之後，繼言「小康」，即使度諸當時的社會情形，其目的也許就是在於認爲「天下爲家」是「天下爲公」不能立刻實現的時代所不可缺少的一種救急或權宜的政策。如果我們按諸今日的社會情形而說話，那麼，我們更必須說「天下爲家」——「小康」是「天下爲公」——「大同」或「世界大同」——之先決的條件。（按：此地所謂「小康」和「大同」二詞，都是用今日的新意義來估價過的，不啻好像「忠、孝」二字用今日的新意義來估價過而使用的一般。）惟其如此，故國父又曾詔示我們說：「我們要將來能够治家、平天下，便先要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註八）國父這幾句話，更爲總裁所具體化，認定在「世界大同」之前必須先告「建國完成」的。（註九）

綜合以上所說，我人姑先舉出一個前提，以爲我中華民族所固有的立國之道德是國民的同時又是世界的；再說一句話，它是人類的。若用前面所引用的禮運篇來稱謂，那麼，我們可以說我中華民族之道德是天下爲家的同時又是天下爲公的；再換句話說，它是小康的同時又是大同的。現在我們爲引伸這個前提起